

化「生」成「熟」？

——從清代「苗蠻圖像」思考民族史研究中的問題



《苗蠻圖冊》之「宋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

古今論衡 第 33 期 2019.12

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僇人，今被朝服。^①

各蠻族皆有「生」、「熟」之分，而「生」、「熟」之分，初無種族上之根本不同，不過因其漢化程度之深淺，予以區別而已。故生熟隨時代而推移，其始爲生，既而進於熟，熟之斯極，遂變而爲「漢」矣。^②

這是我從來沒有研究過的一個領域，但又是糾纏我很多年的一個話題。從我十歲也就是一九六〇年開始，我從北京這個都市，一下子遷到貴州苗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我考上大學從貴州又回到北京。這十七、八年裡，我先是作爲「外地人」，從一個局外人的眼睛裡觀察「本地人」；然後再到當地中學讀書，和好些農村的苗族同學近距離接觸，不分「你」和「我」；再到一九六八年下到所謂最剷悍、最不馴服的生苗山區當知青，幾乎成爲其中一員，從而可以從內部觀察和理解苗族民衆。這些經歷使得我很多年裡，始終在想以下問題：（1）什麼是苗族？他們從來就是一個民族嗎？（2）苗族有共同的歷史嗎？這個歷史應當怎樣敘述？他們的「認同」和「記憶」是怎樣形成的？（3）他們的文化和風俗是怎樣漸漸形成，又漸漸消失的？

以前，大陸有一個很有名的電影叫《青春祭》，是寫知青生活的，改編自一部小說，小說原名是《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電影把名字改成了《青春祭》，改得很有深意。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青春歲月曾經被當作供品，祭祀那個荒誕年代，當然這是一代人的悲劇。不過，由於畢竟那還是青春歲月，它在我的一生中始終不斷喚回對往日的記憶。所以，儘管我並不研究民族史，但這些經歷和這些疑問，總是讓我不時關注民族史，特別是苗族史研究。可是，當我看過一些中國民族史論著的時候，我覺得它們不僅沒有解決我舊的疑問，反而引起了更多新的問題。

所以，這裡借了對《苗蠻圖》（或《百苗圖》）的分析，來談談有關民族史的問題。

一、引言：五族抑或六族？在內外之間的苗族

一九二四年，法國傳教士薩維那（F. M. Savina）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半個世紀裡，這部書多次再版，直到一九七二年還出了新版。在這部書的一開頭，他就說：

* 本文是二〇一八年四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訪問學人講座」中的演講稿，又曾在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蔣經國基金會舉辦的「關中·外緣」西安研習營講演過。這是修訂稿。

① 漢·王充，《論衡·宣漢第五十七》，《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823。

② 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1939），載《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236。

從不可記憶的年代起，在中國就存在一種我們至今不知其起源的人種，這些人一直住在高山上，與其他亞洲人隔絕。說一種特別的、周圍人們所不知曉的語言，穿著一種特別的，任何地區見不到的服裝。^③

這就是苗族。^④過去，好多學者曾經猜測苗族的來源，有人說，他們老家在現在的貴州東部湖南西部（丁文江）；有人說，他們應當是從河南一帶經由四川遷來的（薩維那，F. M. Savina）；還有人說，他們在貴州是外來人，貴州的原住民應當是仡佬人，苗族是從其他地方來的（克拉克，S. R. Clarke）。總之，苗族的起源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

也許現在的人已經不太注意，在晚清民初也就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苗族作為話題，曾經一度很熱鬧，因為有一種關於苗族史的說法，在當時非常震撼也影響深遠，就是所謂的「苗先漢後」說。當時，有很多中外學者都相信，漢族並不是中國的土著居民，苗族才是古代中國最早的原住民，由於從西方來的漢人侵略和壓迫，終於鳩占鵲巢，漢人才逐漸佔據了中國的核心區域。而被打敗的苗族，只好向南再向南，一直遷徙到西南山區，這種說法就叫有關中國原住民之「苗先漢後」說。

說到「苗先漢後」說，當然要追溯晚清學界流行的「漢族西來」說。^⑤這一說法由法國人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的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 《初期中國文明的西方起源》和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漢民族以前的中國諸語言》開端，^⑥並通過日本轉手傳來中國，使得一貫相信歷史是「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國學界深受刺激，當時便引起了好多討論。其中一種說法是，在黃河流域生活的原住民應當是苗族，而傳說苗族祖先是蚩尤，加上古史裡有「竄三苗于三危」的說法，因此一些學者大膽推斷，是傳說中黃帝打敗了蚩尤，這裡隱含的意思就是黃帝所象徵的漢族，把蚩尤所象徵的三苗趕走，漢族人才佔領了黃河流域即中原一帶。這種說法對於那個時代的中國史認知，顯然是

③ 薩維那（F. M. Savina），*Histoire des Miao* 《苗族史》（Hong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1924），p. 1；薩維那在這部一九二四年出版於香港的著作中，從語言、身體、宗教、社會、文化、服飾等方面，相當清楚地界定了自稱「Hmong」的苗族，這是烏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之後，最值得重視的苗族研究著作。據查，此書已有中譯本：立人等譯，《苗族史》（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9），但我未見。國內有關苗族歷史的著作，還可以參看伍新福、龍伯亞，《苗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④ 現在苗族在中國是第四大少數民族（排在壯族、滿族、回族之後）。據二〇〇〇年的統計，約有 894 萬人，在貴州有 429 萬、湖南有 192 萬、雲南有 104 萬、重慶有 50 萬、廣西有 46 萬、湖北 21 萬、四川 14 萬、廣東 12 萬，此外，1 萬人以上的，還有海南（6 萬）、浙江（5 萬）、江蘇（2 萬）、福建（2 萬）。同時，它也是一個國際化的民族，在越南約 80 萬，寮國有約 30 萬，泰國約 1.5 萬，美國有 18 萬（但據 Nicholas Tapp 說，美國有 30 萬），法國有 1 萬（主要是越南戰爭結束時流亡海外的）。參看鈴木正崇，《ミャオ族の歴史と文化の動態——中國南部山地民の想像力の變容》（東京：風響社，2012），〈序文〉，頁 5, 14。

⑤ 關於「苗先漢後」說，最清晰的歷史梳理，見吉開將人，〈苗族史の近代——漢族西來說と多民族史觀〉，《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124（2008）：25-55。

⑥ 有關法國人拉克伯里的「西來說」，可以參看孫江，〈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歷史研究》2010.1：116-137。

具有顛覆性的。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的東洋學界曾經普遍接受這一說法，明治日本一些最重要的學者，仿佛都相信「苗先漢後」說，人類學家裡如研究過苗族的鳥居龍藏，印度學家佛學家如高楠順次郎，法學家如田能村梅士等人，都談到過這個問題。對中國影響很大的日本東洋史學家，如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藤田豐八、桑原鷺藏也都沿用過這一說法，這些說法被寫在歷史教科書裡，也作為研究中國民族、文化和歷史的前提。^⑦

來自日本有關「漢族西來」以及「苗族原住」的論述，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歷史書寫，也影響了晚清民初對「中國」國家、民族與疆域的認知。有趣的是，無論對大清帝國有依戀情結的保守派，還是原本激烈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派，這一說法都有熱烈的接受者。前者比如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1901）、〈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1905），蔣智由的〈中國上古舊民族之史影〉（1903）、〈中國人種考〉（1905）；後者比如章太炎、劉師培、鄒容、陳天華，都曾經接受這種說法。^⑧

看上去政治立場和思想取向不同的這些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實際都有共同處，即都受到西洋人和東洋人有關「民族遷徙」的歷史觀以及「優勝劣汰」的進化論的深刻影響。他們都承認，中國的原住民確實是「苗先漢後」，但漢族取代苗族成為中國主流族群，恰恰是先進民族打敗落後民族的歷史過程。換句話說，苗族被趕到西南甚至更南的邊陲，乃是「優勝劣汰」的歷史選擇結果。當然，前者即試圖維護清帝國原有疆域和族群的所謂「保守派」，他們強調的重心是，既然苗族是更早的中國人，那麼，就應當承認苗族作為中國的土著，就像大清帝國包含滿蒙回藏一樣，苗族可以作為「五族（六族）共和」的一部分，成為在大清帝國基礎上，重建中國／中華民族的成員；而後者即試圖推翻大清建立民國的所謂「革命派」，雖然秉持漢族民族主義的立場，但由於無法承受「割地」、「裂國」的罪名，也不能硬碰硬地靠戰爭實力解決政權轉換，所以，只能採取妥協策略，主張重建的「中國」應當以漢族為主，包容各種異族。所以，採用這一說法所強調的重心，只是用「苗先漢後」說來證明歷史上漢族確實先進和偉大。^⑨於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他們都接受了《清帝遜位詔書》中「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的提議，像孫中山在一九一二年一月擔任臨時大總統時，在〈就職宣言書〉中就承諾「合漢、滿、蒙、回、藏諸

⑦ 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東京：中央堂，1888）、市村瓚次郎，《支那史》（東京：林縫之助，1889）、藤田豐八，《中等教科東洋史》（東京：文學社，1896）、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898）。見上引吉開將人，〈苗族史の近代〉，頁34-37。

⑧ 參看葛兆光，〈納「四裔」入「中華」？——1920-1930年代中國學界有關「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論述〉，《思想》第27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頁1-57。

⑨ 一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個學者松岑在為《獨立周報》撰寫社論〈苗族與共和之關係〉的時候，仍然強調「我祖宗自崑崙而下，殖民東土，東土本部已有主人，是曰苗黎。我祖宗奮其神武，與彼族戰而勝之，遂宅居於黃河兩岸。結繩茫昧，相斫之書不傳，然其物競天演之血史，則可以想像得也」，載《獨立周報》2.18/19（1913）：35。

地爲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¹⁰因此，對於各種非漢族群，革命派的立場也就從「排斥」轉爲「包容」。

可是，那時的「五族」裡面，並不包括苗族！那麼多「五族共和」的說法裡面，上千萬的苗族是否被忽略了？他們人數並不比滿族、藏族少，他們佔有的疆土面積也未必比其他民族小。可是，除了少數學者如梁啟超等之外，¹¹就連後來孫中山在討論中國民族問題時，他提到的「同一血統，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的四萬萬人中，眼中主要是漢人，此外似乎只有「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卻根本沒有提及還有近千萬的苗族人。¹²所以，到了一九一七年，申悅廬就說「五族共和」不正確，「蓋就中華民族而言，實有漢滿蒙回藏苗六族」；¹³同一年夏德渥撰寫《中華六族同胞考說》，也建議在漢、藏、蒙、滿、回之外，加上「苗」，統稱爲「華族」。¹⁴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代，還有人討論中國究竟是五族共和還是六族共和，甚至討論古代的華族是否混血，是同祖還是不同祖。¹⁵

可問題是，「苗」在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中華民族的重建中，這樣被輕輕淡化，究竟是爲什麼？是不是作爲一個非漢族群，它和漢族差異太小，以至於被忽略？北方那個統治過「中國」的騎馬民族蒙古，宗教信仰和人種特徵差異很大的回回，地處西陲而且風俗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不同的藏族，以及剛剛統治過龐大帝國的滿人，是不是因爲這些族群的特性、異質性和歷史重要性，被急需重建「中華民族」的國人重視，而處在生熟、內外之間，似乎逐漸漢化並與漢人雜處的「苗」，卻不那麼受重視？於是，這裡就有問題出來了：第一，是因爲他們在帝國核心區域之內，行政已經郡縣化，身份已是編戶齊民，所以就不被重視嗎？第二，是否因爲他們作爲帝國臣民，和漢人一樣是農耕族群，文化與身份已經逐漸同質化，即處在被「漢化」過程中，所以，他們才不必單列爲一個民族嗎？第三，是否在歷史敘述和歷史印象中，苗

¹⁰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原載《東方雜誌》8.10（1912），收入《孫中山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頁327。

¹¹ 其實，一九〇三年梁啟超就提出，重建中國不僅需要提倡「小民族主義」，更要提倡「大民族主義」的時候，其實已經包容了有苗族在內的「六族」，「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後所以對於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見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之二「論國民與民族之差別及其關係」，《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重印本，1988），文集之十三，頁75-76。

¹²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一講，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九卷，頁188。

¹³ 申悅廬，〈中華民族特性論〉，原載《宗聖學報》2.8（1917）：14。申氏這篇文章，在一九四三年曾重新發表，見《東方雜誌》39.19（1943）：24。

¹⁴ 夏德渥，〈中華六族同胞考說〉（湖北第一監獄石印本，1915年檢定，1917年印行）。參看吉開將人，〈苗族史の近代（三）〉，《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129（2009）：32-33；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第二章，頁118-119。

¹⁵ 比如署名「曲」的〈中華民族（漢，滿，蒙，回，藏，苗六族）考〉，載《培道學生》1935.3：1-4。

族在明清逐漸被「改土歸流」，就不應當算是被「殖民」，不應當算是「內部他者」（王明珂語）呢？

帶著這些問題，多少年來我始終在關注有關苗族史的資料。很多年裡，我的書櫥裡始終放著幾本有關苗族的著作和文獻，像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的《苗族調查報告》、清代田雯的《黔書》、愛必達的《黔南識略》、羅繞典的《黔南職方紀略》、羅文彬等的《平黔紀略》。特別是一九九八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京都大學綜合圖書館偶然看到很少有人看過的，相傳為雍正乾隆之間陳枚所繪的《進貢苗蠻圖》，一時很有感慨，它仿佛一下子打開我的苗疆記憶，於是便托臺北王汎森兄代為尋找了史語所早年出版的《苗蠻圖冊》。¹⁶二〇一二年，又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中，在東京讀到日本學者吉開將人的七篇系列論文〈苗族史の近代〉，雖然還沒有成書，但我也忍不住給他寫了一篇評論，¹⁷這才算真的開始琢磨有關苗族史的問題。

讓我先從明清兩代說起。

二、莫之能外：《苗蠻圖》背後的帝國方略

自從十四世紀中葉，來自南方的漢人朱元璋把北方蒙古的元朝推翻，並建立大明王朝之後，中國疆域就從蒙元那種無遠弗屆的歐亞帝國，重新回到基本是漢族為主的十五省。明代人常常說「嘉峪關外，即非我有」，又說「酒泉，乃中國之絕域重地」。甚至連漢朝設立的河西四郡（酒泉、張掖、武威、敦煌）之一，現在大大有名的敦煌，都不再屬於「中國」所有。儘管永樂皇帝五次北征蒙古，在遙遠的東北設立努爾干都司，但後來明朝的疆域卻一退再退，正如《明史·地理志》所說，「成祖棄大寧」、「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仁、宣之際，南交屢叛，旋復棄之外徼」。¹⁸所以明人王士性《廣志繹》裡說：「本朝北棄千里之東勝，南棄二千里之交趾，東北棄五百里之朵顏三衛，西北棄嘉峪以西二千里之哈密」。¹⁹就連《明史·地理志》也說，明代

¹⁶ 以上各種文獻：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日文本，1903；中文本，國立編譯館譯，上海：國立編譯館，1936）；田雯，《黔書》（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3182-3183冊，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愛必達，《黔南識略》（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羅繞典，《黔南職方紀略》（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羅文彬、王秉恩，《平黔紀略》（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苗蠻圖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

¹⁷ 吉開將人，〈苗族史の近代〉（一）～（七），分別連載於《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124-134（2008-2011）；葛兆光，〈在歷史、政治與國家之間的民族史——讀吉開將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南方周末》2012.09.07。

¹⁸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74，下引二十四史皆同，不一一注明），卷四〇，〈地理一〉，頁882。潘光旦說，「大寧之放棄，是對兀良哈之讓步，開平衛之南移，則為對蒙古之讓步，河套亦然。哈密則似入於吐魯番，應是畏兀爾也」，見潘光旦編，《中國民族史料彙編：明史之部（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1。

¹⁹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方輿崖略〉，頁2。

疆域是「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²⁰也就是說，長城之外、嘉峪關以西都放棄了。如果看明代人張天復《廣皇輿考》卷一八〈四夷總圖〉，就可以看到西北邊疆是甘肅，東北邊疆是遼東，北邊也就是所謂「九邊」，包括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綏（今榆林）、寧夏、甘肅、固原等，擺明了長城以北，即為「異域」。²¹

可是，十七世紀中葉滿人入關之後，卻大大拓展了帝國疆域。後金從天命九年（1624）努爾哈赤降服蒙古科爾沁部，到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滅蒙古察哈爾部建蒙古八旗，再到皇太極崇德七年（1642）又成立漢軍八旗，入關之前就已經包括滿、漢、蒙三族。從順治元年（1644）入關建立大清王朝，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復澎湖、臺灣，二十七年（1688）漠北的喀爾喀蒙古三部歸降清朝，大清的疆域已經超過明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大清帝國打敗準噶爾，使整個內外蒙古、青海等地區歸入版圖，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入伊犁，二十四年（1759）進入喀什噶爾（新疆喀什）和葉爾羌（新疆莎車），佔有整個新疆（回部），達成帝國疆域最大化。最終，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打敗廓爾喀（尼泊爾），制定《藏內善後章程》，確定金瓶掣籤制度，大清王朝終於成為統治「五族（滿蒙回藏漢）」的龐大帝國。如果看看清朝疆域圖（圖一），確實正如《清史稿·地理志》裡面所講的，「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於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²²

但這個龐大帝國內部卻差異性很大，不僅有理藩院所管轄的蒙回藏等，有盛京將軍所控制的龍興之地東北，就連六部所管理的十八省，各種制度也不那麼統一，比如這裡要討論的貴州苗疆。雖然在元明兩代，貴州已經正式納入帝國版圖，但這一苗疆還是「生」的，還沒有「熟」。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些地方雖然不是帝國之「外」，但也不能完全算入帝國之「內」，還只是「之間」。用傳統的說法，它還是在「羈縻」狀態，實行的是「域內」與「化外」的雙重制度。雖然元代已經在貴州設了宣慰司和宣撫司，一方面讓土官土司自己管理，一方面朝廷逐漸派官員進去控制。²³明代前期又沿襲元代的統治方式，但這一區域的管理仍處於雙重體制之間，只是明朝初期以來，大趨勢是它逐漸從「外」而「內」。明太祖朱元璋曾對帝國內部的制度和文

²⁰ 《明史》卷四〇，〈地理一〉，頁882。

²¹ 張天復，《廣皇輿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本，1997]，史部第17冊），卷一八，頁350。

²² 《清史稿》卷五四，〈地理一〉，頁1891。嘉慶二十五年（1820）重修《一統志》時，當時的大清帝國，已經包括了二十七個區域，除了原來所謂內地十八省之外，還包括盛京三將軍（盛京即奉天將軍、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以及藩部所管轄的蒙、藏、准、回等，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簡單的民族（漢）和國家（中國）重疊。

²³ 元代所設置的宣慰使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介於行省與郡縣之間，由當地豪強擔任長官（土官土司），如烏撒烏蒙宣慰司、麗江路軍民宣撫司，由朝廷任命並授予詔敕、印信、符節、驛糧書、金銀符等，土官土司的責任與義務有三，即納賦、朝貢和提供士兵。

古今論衡



化的方式，「選其子孫弟姪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鬥之事，亦安邊之道也」。²⁴但是，僅僅是軟的一手是不行的，永樂十一年（1413），以掃平天下的元世祖為楷模的永樂皇帝，²⁵以解決土司土官的紛爭為由，廢除黔東的思州和思南兩個宣慰司，在貴州建布政司轄八府四州，²⁶又設立都指揮司領十八衛。按照永樂皇帝的說法，「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²⁷也就是古話所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意思。按照他的想法，帝國之內所有的管理者都不能擅自任職而必須由朝廷任命，所有的百姓都不能在化外而應當是編戶齊民。²⁸正如《明史·土司傳》裡面說的，「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²⁹

這一我稱之為「納四裔入中華」的趨勢，在明代一直延續。到了嘉靖九年（1530），朝廷更規定，這些區域的政府官員，分為文、武兩道，政府委派的府、州、縣官員歸布政司管，土官所擔任的宣慰、招討等，歸都指揮司管，「於是文武相維，比於中土矣」。³⁰更重要的一個舉措，發生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那一年，明朝軍隊用了104天，兵分八路討伐播州土司楊應龍，「共斬級二萬餘……播州自唐入楊氏，傳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亡」。³¹從此，中央王朝的權力進一步深刻地嵌入這個過去在內外之間的「西南夷」地區。³²明清易代之後，朝廷上雖然從漢人換

²⁴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以下引《明實錄》皆同，不一一注明），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朱元璋因戶部主印張永清上奏，諭禮部曰：「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這一段話表現了明王朝對邊遠地區亂象的憂慮和努力將邊地漢化的意圖。（頁3476）

²⁵ 宮崎市定《中國史》（焦堃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曾經指出，永樂帝「並非只想做明太祖的忠實後繼者，而是想成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沒有完全實現」（頁259）；檀上寬在《永樂帝——華夷秩序的完成》（王曉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發揮宮崎市定這一說法，並專門設立了〈超越忽必烈〉一章，可以參看。（頁198以下）

²⁶ 八府，即思州（今貴州岑巒）、思南、鎮遠、銅仁、石阡、黎平、烏羅（今貴州松桃）、新化（今貴州黎平東北）。

²⁷ 《明史》卷三一六，〈貴州土司〉，頁8168。

²⁸ 明代沿襲元朝的制度，但更加嚴格，這裡有三點很重要：（1）土、流分治，界限清楚；（2）以文、武分別隸屬，以官品分出等級；（3）土官土司由朝廷任命，需要親自到京接受任命。不過，在明代這一過程並不徹底，苗疆仍然比較特殊，明代中期在今吉首、鳳凰等地設立土司、衛所並駐軍，還是力圖隔開生、熟，明代官員還繪製了《麻陽圖》（在羅洪先《廣輿圖》中，嘉靖二十年〔1541〕）、《楚邊圖說》（吳國仕編，萬曆四十五年〔1617〕），特別是後一幅，繪出今湖南的鳳凰、芷江、貴州玉屏、清溪、鎮遠、施秉等州的衛所、營哨、炮樓、邊牆等等，顯示出那個時代，「楚邊」還是帝國核心區域的內部「邊疆」。

²⁹ 《明史》卷三一〇，〈土司〉，頁7981。不過，應該注意到，永樂十一年設立貴州布政司之後，「許多地方在很長的一個時間內，仍無府、州、縣設立」，明清帝國行政權力在貴州苗疆的滲入，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參看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撰，《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第二編第三章，頁494。

³⁰ 《明史》卷三一〇，〈土司〉，頁7982。

³¹ 《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二〉，頁8049。

³² 不過，直到明代萬曆年間平定播州之後，大明帝國仍然沒有能夠真正把這一帶，完全納入府州縣行政管理之下，主要還是保障內地通往雲南的「普安入黔」之路的通暢。正如萬曆三十三年（1605）貴州巡撫郭子章所說：「貴州一省，苗仲雜居，國初雖設貴州、新添、平越、威清等十四衛，分布上下，以通雲南之路。而一線之外，北連四川，東接湖廣，南通廣西，皆苗仲也」。《明神宗實錄》卷四一四，頁7759-7760。

成滿人，但雍正年間鄂爾泰的「改土歸流」，也還是沿襲了明朝的一貫思路「化生為熟」，即大力推進帝國直接控制下的郡縣制度、民衆的編戶齊民化以及通過教育和科舉的漢族文明化。

「改土歸流」和「化生為熟」，是明清兩代推動帝國內部同質化的大趨勢，³³ 它也刺激了官僚和士大夫有關邊疆的知識興趣。如果說，唐宋以來對於苗疆的知識還相當稀少，對於苗疆的地理還幾乎是空白，³⁴ 那麼明清兩代有關貴州和苗疆的知識就越來越多，很多漢族知識人都曾深入苗疆。其中，王陽明在貴州龍場的故事當然是最有名的，同時，關於貴州和苗疆實際知識，也有了許多著作在明清兩代被陸續撰寫出來。³⁵

不過，帝國內部同質性仍然在這個區域沒有建立。儘管《明史·貴州土司》說，明朝永樂十二年（1414）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象徵著「貴州為內地自是始」。³⁶ 可是事實上一直到清代初期，甚至大清王朝建立之後的八十餘年，苗疆在帝國的「內部」仍然彷彿「空白」。雍正四年（1726），鄂爾泰在〈改土歸流疏〉中這樣描述，「苗疆四圍幾三千餘里，千三百餘寨，古州（今貴州榕江）踞其中，群寨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蟠據梗隔，遂成化外」。³⁷ 什麼是「化外」？「化外」就是在國家與文明之外。這裡舉兩個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康熙年間的《皇輿全圖》裡面，帝國大多數地方都標明府、州、縣名，但苗疆（幾乎包括現在黔東南的十幾個縣市）是一片空白（圖二）；二是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吳國仕編的《楚邊圖說》中，特意繪出從如今的湖南鳳凰、芷江、貴州玉屏、清溪、鎮遠、施秉等地區的衛所、營哨、邊牆，而嘉慶年間嚴如煜編《苗防備覽》中的〈苗疆全圖〉中，面對苗疆也有一道「邊牆」，仿佛古長城面對匈奴一樣，說明那塊「苗疆」還是「外」而不是「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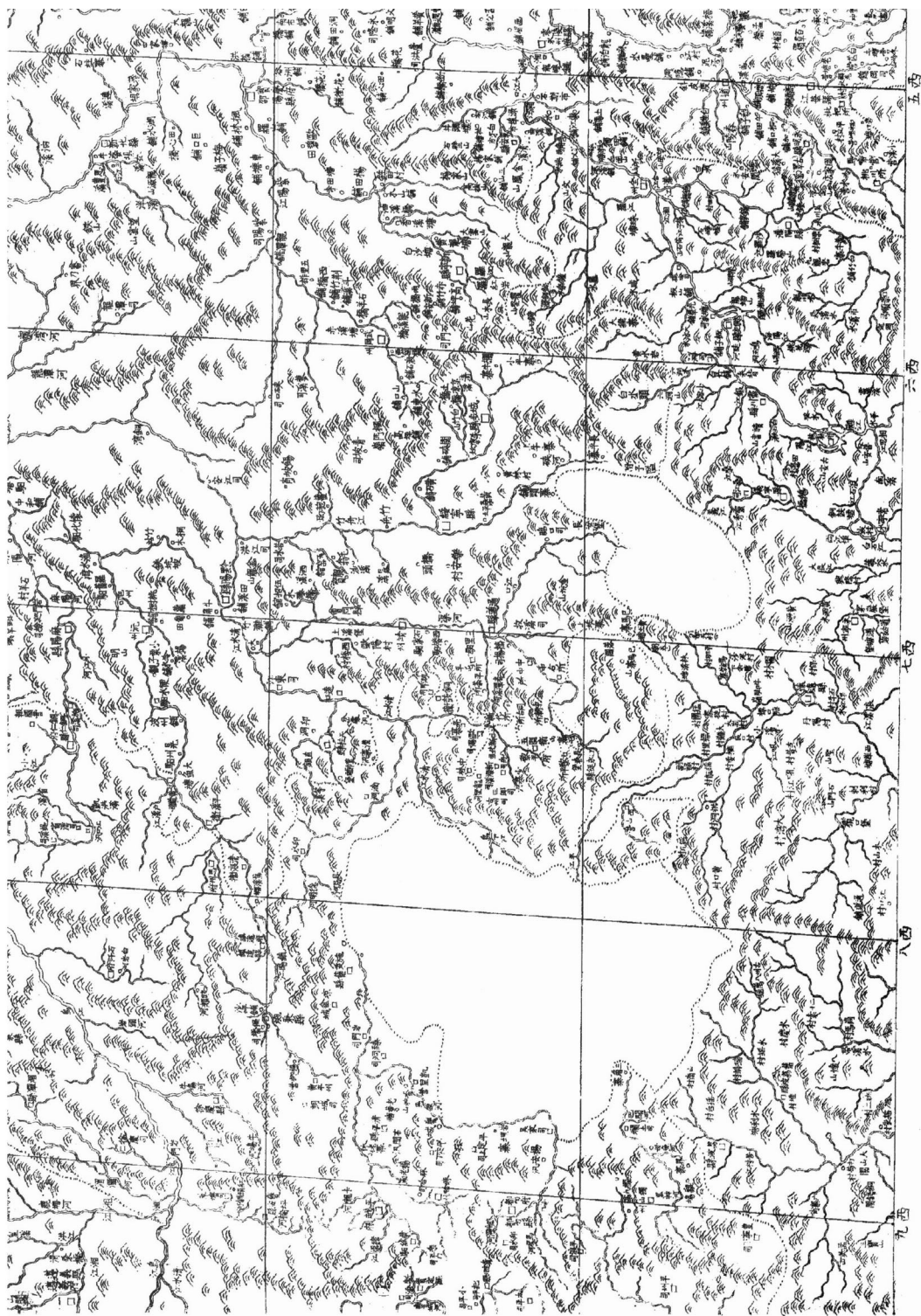
³³ 江應樑曾經指出，「改土歸流」是一個漫長過程，從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沐英征服越州的龍海、阿資，設越州衛開始，明清兩代嘗試改土歸流。以雲南為例，清代順治十六年（1659）元江改流，康熙四年（1665）蒙化改流，同一年，革除教化、王弄、安南三個長官司，設立開化府，實際上，這一過程到雍正年間仍然沒有完結。根據魏源《聖武記》的記載，雍正時代四川還有長官司（土司）二十六、貴州有長官司六十二，廣西有長官司三，雲南就更多了，有長官司三、土府四、土州四等等，這是雍正四年（1726）改土歸流之前西南地區的大背景。參看江應樑，〈略論雲南土司制度〉，原載《學術研究》（昆明）1963.5，後收入《江應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頁333。

³⁴ 例如經常被引用，被作為苗族史重要資料的宋代朱輔《溪蠻叢笑》，不僅主要描述的只是湖南辰州一帶，即後來苗疆比較接近漢族地區的邊緣，而且有關知識的記錄也相當粗略。這恰恰說明，宋代對於苗疆知識的缺乏，與明清兩代日漸增多的苗疆知識，不可同日而語。

³⁵ 官方編纂的，最早的如弘治年間沈庠修、趙瓚纂《貴州圖經新志》十七卷、嘉靖年間謝東山修、張道等纂《貴州通志》十二卷，萬曆年間王耒賢、許一德修《貴州通志》二十四卷等；到了清代乾隆之前，又有康熙十二年曹申吉修、潘馴等纂《貴州通志》三十三卷、康熙三十一年衛既齊修、薛載德纂《貴州通志》三十六卷、乾隆六年鄂爾泰、張廣泗修《貴州通志》四十六卷、乾隆二十六年謝聖綸纂《貴州志略》十四卷等等。士大夫自己編纂的，如明嘉靖年間田汝成《炎徼紀聞》、萬曆年間郭子章《黔記》六十卷、清康熙年間陳鼎《滇黔紀遊》兩卷、陸次雲《峒谿織志》三卷等等。

³⁶ 《明史》卷三一六，〈貴州土司〉，頁8178。更早在明太祖洪武年間（1382），貴州就設立了都護使司，但主要還是管理軍事駐防的機構，布政使司則是帝國進行行政管理的機構。

³⁷ 《清史稿》卷二八八，〈鄂爾泰〉，頁10231。按：《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下冊所收鄂爾泰〈改土歸流疏〉沒有這一段，並不是全文。



圖二：《（康熙）聖興全圖》之苗疆部分一片空白，空白處包括今雷山、台江、錦屏、天柱、劍河、丹寨、麻江以及三都等（作者提供）

三)。³⁸其中，貴州東部即今黔東南尤其是帝國內部的心腹大患，所以魏源《聖武記》裡面說：

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³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已經注意到這並不只是族群問題，所謂生苗中最強悍的九股苗裡，居然還有漢人（如曾文登）給他們出謀劃策。所以，苗疆成了大清帝國內部，尤其是六部所管轄的帝國內地實現版圖完整和制度同一的障礙。於是，從雍正四年（1726）開始，朝廷就雙管齊下，一方面派出大量軍隊，對這一苗疆進行殘酷掃蕩；一方面勸誘熟苗，用優惠政策讓他們接受改土歸流，成為編戶齊民。

這一場叫作「改土歸流」的戰爭，比我們想像的要殘酷。儘管明清兩朝君臣上下都主張兩手兼備，但實際上，軟性的招撫和教育的背後，都是有軍事威懾的力量支撐的。我們不妨看一看《清史稿》、《東華錄》、《聖武記》等文獻中，對雍正年間苗疆「改土歸流」過程的簡要記錄：

雍正四年（1726）春，鄂爾泰上〈改土歸流疏〉說「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⁴⁰五月，鄂爾泰率軍隊從谷隆、焦山、馬落孔三道進入，「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抓捕鎮遠土知府等若干土司土官，這些地方逐漸改土歸流。⁴¹



圖三：《苗防備覽》之〈苗疆全圖〉，可注意圖左方有防苗之邊牆

³⁸ 清代嘉慶二十五年（1820）嚴如煜，《苗防備覽》（道光二十三年紹義堂重刻本）卷首之〈苗疆全圖〉；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但是此書完成較早，序言寫於1940年，因為抗戰的緣故，出版較遲。此據後來的排印本，北京：民族出版社重印本，2003）引用此書指出，「苗疆」大體上是沅江以西，酉水以南，辰江以北的湖南、貴州兩省交界，包括今貴州黔東南、黔南、黔西南、安順、六盤水、松桃和湘西等。席會東，〈消失的邊疆——明清地圖中的苗疆與生苗〉（發表於雲南大學歷史系、《學術月刊》雜誌社主辦，「多維視野下的中國邊疆與族群」學術研討會〔2015年8月14-15日〕，下冊，頁515-534）也指出，湘西臘爾山區、貴州雷公山和古州（今貴州黔東南榕江）地區、廣西東北，在明清稱為「苗疆」，當時「無君長，不相統屬」，就像「化外之地」。

³⁹ 魏源，《聖武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402冊），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記〉，頁302。

⁴⁰ 《清史稿》卷二八八，〈鄂爾泰〉，頁10230-10231。鄂爾泰有關雲南貴州改土歸流的歷次上疏，如〈改土歸流疏〉、〈雲貴事宜疏〉、〈分別流土考成疏〉、〈正疆界定流土疏〉、〈招撫生苗以安三省疏〉，均可參看《清經世文編》，下冊，頁2136-2142。

⁴¹ 清朝控制苗疆的八寨廳、丹江廳、古州廳、都江廳、清江廳、台拱廳等六廳，都是在雍正年間設立的。

雍正七年（1729）三月，張廣泗進攻生苗腹地貴州丹江雞溝，「破其寨，種人悉降。上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諸地以次定」。⁴²七月，湖廣總督邁柱建議，選擇苗疆「悅服之人，立為苗長，以稽捕緝之事」，又「于苗疆州縣選安分勇敢之土苗，每處用一二十名，充當民壯」，這就是「以苗制苗」的策略。⁴³

雍正十二年（1734），雲貴總督尹繼善上奏「貴州苗疆新辟八事」，其中尤其對剽悍的九股苗地區，要清查寨界，「擇舊苗之良善者，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約束稽查」。⁴⁴

雍正十三年（1735），由於苗疆再次發生變亂，「苗患日熾，焚掠黃平、施秉諸地」，於是朝廷令貴州提督哈元生率領雲南貴州「漢土官兵一萬數千名」，董芳率領「楚兵五千」、「粵東粵西兵八千」，再加上撫定苗疆大臣張照的軍隊，剿平叛亂，雍正皇帝下令「將清江、台拱上下九股凶苗，及內地倡首附近逆惡諸寨，痛加剿除，務盡根株」。不久動亂平定，哈元生上奏說，「斬獲無算，驛路開通」。而鄂爾泰則因為以前「布置未協」而「引咎請罷斥，並削去伯爵」。⁴⁵

歷時近十年的改土歸流，逐漸把過去帝國空白處的苗疆，變成郡縣制度，把過去剽悍生猛的苗人，變成編戶齊民。

這當然是大清帝國殖民事業的大成功，不過對於苗疆來說，它無疑也是一個充滿戰火和鮮血的過程。⁴⁶

三、圖繪蠻夷：《苗蠻圖》（或《百苗圖》）的誕生

作為一個帝國，在政治史上大概有三種圖像，作為象徵格外重要。第一種是帝國表示自己控制疆域的「輿地圖」，第二種是帝國想像自己籠罩天下的「職貢圖」，第三種則是帝國清點管轄之內的異族臣民的「蠻夷圖」。

⁴² 《清史稿》卷二八八，〈鄂爾泰〉，頁10233。

⁴³ 蔣良騏，《東華錄》（濟南：齊魯書社，2005），卷三〇，頁468。

⁴⁴ 蔣良騏，《東華錄》卷三二，頁496。

⁴⁵ 《清史稿》卷二八八，〈鄂爾泰〉，頁10235；蔣良騏，《東華錄》卷三二，頁501-504。

⁴⁶ 比如《聖武記》裡就記載，雍正年間改土歸流，在鎮雄，參將韓勳「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頁304），在烏蒙，哈元生殺死苗彝兩勇將，「竿揭二首」，在威遠，「冒瘴突入，擒斬千計」（頁305）。又，不止是在貴州，倪蜕，《滇雲歷年傳》（又名《雲南事略》）卷一二記載，雍正年間鄂爾泰手下的哈元生、張耀祖在雲南永善剿滅彝族時，手段也極其殘酷，曾下「沉命法」，下令「在者殺，去者殺，婦孺殺」。並記載他們「鑿顱、批面、剝手、截足、割腹、抽腸、活縛、升竿，極千古未有之慘酷，凡三萬餘人……血肉淋漓，掛于樹石間者，互十里不止」。見李埏校注，《滇雲歷年傳》，收入《李埏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8），第四卷，頁367。

雖然至少從中古時代的梁元帝開始，《職貢圖》之類的圖像已經成為政治史和繪畫史上的傳統，但真正成為構造王朝神聖性的政治策略，由官方大規模組織繪製，大概是在清代才最終成熟。前面說到，從大明到大清，中國疆域發生了很大改變，「異邦」變成了「新疆」，「外夷」成為「臣民」。清朝版圖的擴大，使得帝國內部的文化差異變得相當明顯，於是，各種各樣描繪異族的「職貢圖」紛紛出現（如謝遂、丁觀鵬、姚文瀚、程梁、金廷標的作品）。特別是乾隆十三年（1748），在平定大小金川的動亂後，乾隆皇帝就想由朝廷統一繪製各地的民族風俗圖像。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下旨，由軍機處統管此事，並把現有的樣本發到「近邊各督撫」，讓他們按照標準樣式，繪製各地的圖冊。⁴⁷二十二年（1757），太監胡世傑繳上一套《職方會覽》，乾隆便下令讓丁觀鵬等人依照這種圖冊，去畫四卷圖像。此後的若干年中，他們又根據軍機處提供的資料，以及陸續看到的實際來朝使團情況，加上了哈薩克、伊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這四卷圖冊不僅畫完呈交御覽，而且還由其他畫家另外臨摹了好幾份，並且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特別繪製了《皇清職貢圖》，收入《四庫全書》之中。此後，一直到嘉慶十年（1805），朝廷還命令繪製者補充了巴勒布大頭人、越南等等，由莊豫德等人重新繪製。⁴⁸

在最後形成的九卷本《皇清職貢圖》的第八卷中，繪有四十二種貴州苗蠻人物圖像，顯示出當時對於苗蠻的分類已經相當細緻。其中，有以服色為區別的花苗、紅苗、黑苗、白苗、青苗，有以方位為區別的東苗、西苗，也有以姓氏為標誌的宋家、仲家、龍家、蔡家，也有風俗各異的生苗如紫姜苗、九股苗，還有現在已經劃在苗族之外的侏羅和仡佬。

這種類似人種誌（Ethnography）的圖像，⁴⁹刺激了官僚和士人群體對苗疆的興趣，各種苗蠻圖冊就是在這個帝國開拓和內部整合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目前發現的各種苗蠻圖冊，林林總總近百種，⁵⁰收藏在國內國外的各個機構中。它們的圖像數量

⁴⁷ 《清實錄》（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己巳）記載乾隆諭旨「我朝統一寰宇，凡屬內外苗夷，莫不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今雖有數處圖像，尚未齊全。著將現有圖式數張，發交近邊各督撫，令其將所屬苗、獠、黎、獯，以及外夷番眾，俱照此式樣，仿其形貌衣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朕以幅員既廣，遐荒率服，俱在覆含之內，其各色圖樣，自應存備，以昭王會之盛」。

⁴⁸ 按照現在的國家觀念，《皇清職貢圖》裡的「諸蠻夷」，有的是外國，有的是異族，有「內」和「外」的不同，但這種有明確國境線的「內」和「外」，乃是現代國際體系和現代主權國家形成之後的事情，在這些圖像中反映了大清帝國的觀念，就是這些朝貢者都是一圈一圈由內向外擴展的「蠻夷」，只是由近及遠，等級不相同，文明有差異。在這樣一個天下帝國的圖景裡面，沒有必要區分「內外」或者是民族、外國，這說明什麼？當然很簡單，就是大清王朝是一個自認的「天下帝國」。

⁴⁹ 美國學者何羅娜（Laura Hostetler）與狄大衛（David Deal）合作，曾翻譯了一冊苗蠻圖，題為 *The Art of Ethnography: A Chinese "Miao Album"* 《人種誌的藝術：一冊中國苗圖》（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⁵⁰ 據海外學者如德國學者 F. Jaeger 和美國學者何羅娜（Laura Hostetler）的統計，目前各種苗圖在海外大約有八、九十種，其中英國 19 種、義大利 16 種、美國 14 種、日本 12 種、德國 7 種、法國 6 種、俄羅斯 10 種、捷克 2 種。對於國外收藏的各種苗圖，現在國內最全面的統計和描述，是史暉，《國外「苗圖」收藏與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9，祁慶富教授指導）。但此博士論文至今未見完整出版，只看到她的一篇同名論文〈國外「苗圖」收藏與研究〉，《民族藝術》2009.4：55-59。

不一，文字內容也有不同，對苗人分類也有出入，各種圖冊的傳承系統至今仍然沒有特別清晰的研究，⁵¹究竟哪一種才是最早的祖本？現在不是很清楚。很多學者最重視的苗蠻圖冊，大概要算清代嘉慶年間陳浩所編的《八十二種苗圖並說》，但事實上，有關苗圖可能出現得很早。⁵²一九九八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學總合圖書館看到一冊題為「陳枚恭畫」的《進貢苗蠻圖》兩函，這是京都大學在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入藏的，其中第一函43幅，第二函18幅，另有散落的4幅，一共65幅。如果「陳枚」這個題識不是作假的話，那麼，這份苗蠻圖冊要遠遠早於嘉慶的陳浩之圖，也可能略早於乾隆年間《皇清職貢圖》，⁵³因為據文獻記載，陳枚是江蘇婁縣人，字載東，號窩枝頭陀，善於繪畫人物山水花鳥，是雍正年間在內務府任郎中的。⁵⁴

誰是這些異族的繪製者和觀察者？應當注意的是，現在可以視為人種誌的這類苗蠻圖像，其實，都是通過官方或知識人的眼睛來觀看的，在繪畫及敘述中，不免都有他們的觀念和偏見。清代中葉之後，陸續出現了很多有關邊地異族的圖像，這些圖冊除了《皇清職貢圖》無所不包、內外兼有之外，似乎特別集中在西南和東南，即對所謂「新開疆土」中的苗蠻、滇人、番人的圖繪，即各種《黔苗圖》、《滇苗圖》、《瓊黎圖》和《臺番圖》。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現在被研究得最多的是以下三種：（1）滿族官員六十七（生卒年不詳，約在乾隆九年即1744年於臺灣任監察御史）大約於乾隆初年主持繪製的、記錄臺灣土著的《番社采風圖》，⁵⁵（2）嘉慶年間陳浩（嘉慶初年任八寨理苗同知）記錄貴州苗彝各族的《八十二種苗圖並說》，以及（3）伯麟（1747-1824）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編撰的、關於雲南的《滇省夷人圖說》。⁵⁶

⁵¹ 可以參看：李漢林，《百苗圖校釋》（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1）；楊庭碩、潘盛之，《百苗圖抄本匯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劉鋒，《百苗圖疏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李德龍，《黔南苗蠻圖說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等。也可以參看：何羅娜（Laura Hostetler）和狄大衛（David M. Deal），*The Art of Ethnography: A Chinese "Miao Album"*《人種誌的藝術：一冊中國苗圖》；何羅娜（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中國的人種誌與圖像學》（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王富文（Nicholas Tapp）和丹·庫恩（Don Cohn）合編，*The Tribal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ithin*《中國西南的部族》（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2003）。

⁵² 目前，很多苗圖研究都以陳浩《八十二種苗圖並說》為中心，並把「百苗圖」看成是《八十二種苗圖並說》以及它的一系列鈔本的總稱，如馬國君、張振興，〈近二十年來「百苗圖」研究文獻綜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1.4：44。但是，這並不能包括在陳浩之前已經出現的各種苗圖，因此本文不用「百苗圖」這一概念，而用「苗蠻圖冊」這個詞，當然，用這一詞彙，只是延續傳統稱謂，並沒有把苗族視為蠻夷的意思。

⁵³ 這個看法，在海外學者中也曾提出，如前引何羅娜（Laura Hostetler）和狄大衛（David M. Deal）《人種誌的藝術：一冊中國苗圖》，其序文中提到這一點，這篇序文有中譯本，見《民族學刊》2010.1：105。

⁵⁴ 又如，巴黎漢學研究所藏《苗蠻圖冊頁》，卷首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舫亭序（乾隆歲次丙午秋九月中浣舫亭識），如果此序文可信的話，這一《苗蠻圖冊頁》就比陳浩的《八十二種苗圖並說》要早幾十年。

⁵⁵ 現有《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卷首附有杜正勝先生的詳細解說。

⁵⁶ 現有影印本《滇省夷人圖說·滇省輿地圖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滇省夷人圖說》收圖108幅，彩繪，附有伯麟跋文。

這些圖像，當然是我們瞭解當時苗疆族群文化風俗的重要文獻。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我們很難僅僅依據它來確定貴州苗疆的族群、文化、風俗。其中一個原因，是那個時代的政府官員對於「異族」雖然觀察仔細，但受到傳統華夷觀的影響，形成某種製作圖像的「格套」，也因為管理者為了確認「種類」的動機驅使，記錄和分類不免粗細不均；而這一類圖像內容的選擇和表達，則往往受到漢族文人（或滿族官員）的優越感和獵奇心影響，不免呈現得並不公平。可是，由於帝國過去對苗疆統治較為薄弱，明清兩代的士人對於邊緣異族知識也只是好奇和耳聞，那裡的族群、歷史和風俗，究竟如何？在這些圖像之前的明清兩代，雖然也有所記錄，卻不那麼仔細。最早有關貴州苗夷的明代文獻田汝成撰《炎徼紀聞》卷四說：

苗人，……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為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⁵⁷

這裡只是根據是否朝廷的編戶齊民，對苗疆做了「生苗」與「熟苗」的分別。但是，隨著對貴州苗疆的知識增長，從明到清，對被稱為「苗」的族群就漸漸越分越細，直到我們討論的清代中期這些苗蠻圖，尤其是陳浩《八十二種苗圖並說》，似乎形塑了對苗疆族群的認識。

但是，這裡有三個問題必須注意：

第一，被統稱為「苗」的貴州非漢人群，究竟可以細分為多少不同的族群？⁵⁸

較早如《大明一統志》卷八八「貴州布政司」條下，曾經引用「舊志」說，那裡的族群「種類非一」，也記載了有羅羅、宋家、蔡家、龍家、仡佬等，但是顯然對於較為接近漢族的三大家（宋、蔡、龍）較為了解，而對其他各種苗人卻不甚了了。到了康熙年間的陳鼎《滇黔紀遊》，則記載貴州有「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青苗、白苗、谷蘭苗、紫姜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天苗、紅苗、生苗、羅漢苗、陽洞苗、黑羅羅、白羅羅、八番苗、打牙猺、剪頭猺、木猺、狛家苗、土人苗……共三十餘種，風俗各異」；⁵⁹同為康熙年間的田雯《黔書》，在「苗蠻種類部落」一則中，則提到「盧鹿」（「水西之羅鬼」，即倮倮）、「狛家」（「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即仲家苗）和「生苗」（包括谷蘭、九股、紫姜、黑苗、紅苗、羅漢苗）這三種之外，還

⁵⁷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3979冊），卷四。

⁵⁸ 其中尤其是被稱為「白羅羅」和「黑羅羅」，也就是後來被識別為「彝族」的部分，更與苗族不能劃為一個族群，烏居龍藏曾經指出，貴州的苗子、雲南的撣族和傣族「實為貴州、雲南、四川三省之三大特殊人種」。見烏居龍藏著，國立編譯館譯，《苗族調查報告》，〈緒言〉，頁5。

⁵⁹ 陳鼎，《滇黔紀遊》（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影印本，1996〕，史部第255冊，據北京師範大學藏清康熙刻本影印），頁21上。

包括東苗、西苗、花苗、白苗、短裙苗、白倮、仡佬、木佬、龍家，以及蠻人、獐人等不同部族；^{⑥0}到乾隆年間的《皇清職貢圖》中則增加到四十二種，在貴陽花苗、銅仁紅苗、黎平古州黑苗、貴定龍里白苗、修文鎮寧青苗，以及貴築龍里東苗、平越清平西苗之外，更加細分出了不少，像龍家就分出普定永寧的馬鐙龍家和廣順大定的龍家；而到了現代學者普遍關注的嘉慶年間陳浩《八十二種苗圖並說》，則分得更細緻，由於這一苗圖影響極為廣泛，^{⑥1}因此奠定了後來所謂「八十二種」的苗疆族群分佈的基本格局。^{⑥2}但是，所謂苗疆的「苗夷」，從族群上說，真的可以分八十二種嗎？這種細密的族屬分類依據是什麼呢？^{⑥3}

第二，反過來說，這些數量眾多、差異很大的人們，可以在一個「苗」字下，歸為一個族群嗎？

無論從語言、習俗、服飾上，還是歷史敘事和自我認同上，各種《苗蠻圖》中所謂的「苗」，顯然都不是一個自我界定很清晰的族群。除了現在已經被「民族識別」分別開的，如彝族（黑羅羅、白羅羅）、布依族（仲家）、水族（水家苗）、侗族（洞苗）之外，恐怕還有很多被稱為「苗」的人，如果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或許本來應當歸為其他族群，^{⑥4}甚至原本是華夏或漢族人。比如，仲家苗傳說是五代時期隨著楚王馬殷從廣西遷來的，^{⑥5}宋家苗「本中國之裔」，據說是春秋時代宋國後裔，蔡家苗傳說也是來自內地，春秋時代「為楚子所俘」的蔡國後裔。被稱為「洞苗」的那一部分，在今天柱、錦屏兩地，據說「苗通漢語居平坦，善種棉花力墾田」；而被歸入「苗蠻」的瑤人，雖然也祭祀盤瓠，但原本並不在貴州，是雍正年間才從廣西遷來，而且他們自有文字，「所藏之書，名為旁磚，圓印篆文，義不可解，且自珍而秘之」。^{⑥6}特別是

⑥0 田雯，《黔書》卷一，頁7-8。

⑥1 陳浩的這個苗圖影響很大，後來各種各樣模仿重繪的《苗蠻圖》、《黔苗圖》或《百苗圖》，散佈在世界各地，一九七三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芮逸夫作序的《苗蠻圖冊》，就是其中之一。這部作品在西文學界影響也很大，著名的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最早於一八五九年就在《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苗族概說〉（*Sketches of the Miao-tsze*），介紹了這個《八十二種苗圖並說》，因此後來影響很大。一八九四年，英國傳教士克拉克（George W. Clarke）又全文翻譯了根據陳浩本重繪的《黔苗圖說》八十二種，題為“Translation of a Manuscript Account of the Kwei-chau Miao-Tzu”，作為柯樂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1848-1914）的著作 *Across Chryse: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 《通過華南邊疆從廣州到曼德勒旅行紀事》一書的「附錄」。

⑥2 也有分得更細的，比如程樹棠〈中國西南的苗族〉，居然把貴州苗族分成九十九種。載《珞珈月刊》2.6（1935）：1238-1244。

⑥3 有一種說法，即英國傳教士克拉克（George W. Clarke）認為，貴州的非漢族人群，簡單區分，可以分為仡佬、苗、倮羅（彝）和仲家。姑備一說。

⑥4 舉一個例子，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人甚至把「擺夷」（傣族）和「野人」（景頗）也歸入廣義的「苗族」，見李燦，〈雲南邊區的兩種苗族：擺夷與野人〉，《文化建設月刊》3.7（1937）：105-112。

⑥5 明代沈庠等《貴州圖經新志》：「五代時，楚王馬殷遣八姓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遂各分據，號八番」。郭子章《黔記》同。當然，也不排斥他們這種歷史溯源，是為了納入主流而主動攀附。

⑥6 見早稻田大學藏《黔省諸苗全圖》（早稻田文庫本）之「獐人」。

在宋元明清近千年的歷史上，有很多漢人進入貴州，⁶⁷明代衛所軍人連同家屬甚至超過萬人，更有輾轉謀生的外地移民以「商屯」、「民屯」進入貴州，也有經營圖利的漢族商人和工匠，尤其是開採朱砂的官商，甚至也有混入苗民之中，以出謀劃策謀生的讀書人。⁶⁸最近看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逃避統治的藝術》，⁶⁹其中就討論到，很多雲南、貴州的族群，其實可能就是逃避中原王朝、來自各地的「移民」。

第三，這些非常複雜的被稱為「苗」的族群，可以追溯出共同的歷史淵源嗎？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能有共同的歷史認同嗎？⁷⁰

烏居龍藏在其開創性的《苗族調查報告》中指出，中國古代文獻中有關南部蠻族的記載，很難區分他們分別是苗，還是瑤、侗、僮、僚。⁷¹在現在的各種民族史著作中，除了傳說中的祖先「蚩尤」和籠統含糊的名稱「西南夷」之外，很難有一個清晰條理的歷史系譜。過去，很多學者習慣把歷史文獻中的各種異族名稱，與現存的各種少數族群做精準對接。不妨舉幾個例子：比如，對西南苗彝，有人就把中古時期信仰盤瓠的武陵蠻、五溪蠻和苗族對接，⁷²但在傳統文獻記載中，中古時期這兩種蠻族都在湖南西部，雖然靠近「苗疆」也就是苗人核心區域，但主要是在苗疆東邊；又比如，也有人根據《新舊唐書合抄》的記載，把苗瑤追溯到「東謝蠻」和「西趙蠻」，認為前者分佈在牂牁管轄的貴州東北部，而後者分佈在今廣西、湖南、廣東三省交界處。他還根據費孝通的猜測，斷定東謝和西趙的分化，就是「苗」和「瑤」的分化。

⁶⁷ 最近就有人指出，「今日所論之苗族、侗族或其他少數民族，若細辨人口移動史，其先祖在明清乃至民國時期，或即是漢人」，見吳才茂，〈超越地域與民族：清水江文書研究再出發〉，《中國史研究動態》2017.5：45。

⁶⁸ 宋代的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二〈外國門〉中說到海南黎人的一個現象，可以說明，自從宋代起，就有漢人摻入異族的現象，他說黎人有生熟，其中「熟黎多湖廣、福建之姦民也，狡悍禍賊，外雖供賦于官，而陰結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經由村峒，多舍其家」（頁70）。

⁶⁹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王曉毅譯，《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168。

⁷⁰ 最近看到麻勇斌〈苗族跨國認同研究的四個問題〉，此文討論苗族形成跨國認同問題，我大體歸納其觀點如下：一是要把蚩尤視為一個歷史人物，建立各地苗族共同的歷史記憶；二是對於苗族不同自稱和他稱，要歸納出共同的語音和語義關係，使不同自稱的苗族之間形成有語源上的聯繫；三是用傳統文化（內力）和國家力量（外力），使不同自稱的苗人建立「苗族」的認同；四是中國學者要針對西方的誤解，對苗族跨國認同要有所作為。見《地域文化研究》2018.3：56-66。但這主要說的是跨國的苗人之認同如何建立，而不是原有苗族的認同之狀況。這種建立苗族自我認同的焦慮，反而說明民族識別之後形成的「苗族」，在歷史認同方面還存在一些難點和問題。

⁷¹ 烏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第一章〈關於苗族之文獻〉，頁1。但過去很多民族史著作，往往會把這些歷史記載中的古代族群名稱，與今天經由民族識別後確立的各種實際族群一一對應，如獠對應「瑤」，獠對應「壯」，獠對應「侗」，獠對應「仡佬」。

⁷² 如日本學者村松一彌就以信奉「盤瓠」為根據，把武陵蠻之五溪蠻算是苗瑤之來源；見其〈關於苗、瑤、壯、彝族的歷史〉一文，陳翠年譯自《中國の少數民族：その歴史と文化および現況》，載《民族史譯文集》第五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78），頁81；又見陳心傳，〈五溪苗族兵事〉（及續一至三），載《邊聲月刊》1.4-7（1940）；從這個標題可以看出，「五溪蠻」和「苗族」就在起源和歷史上產生直接聯繫了。

但是問題是，這種猜測與後來苗族的核心地域並不吻合，也很難有清晰的歷史系譜可供追尋；^⑬再比如，也有人把宋代的辰州蠻和苗族對接，但宋代的辰州蠻主要在「潭之梅山」（今湖南安化、新化），即今沅水、資水之間；儘管我們不能說武陵蠻、五溪蠻、辰州蠻就一定和現代苗族無關，但顯然現代苗族絕不是它們的「一線單傳」。顯然，我們無法清晰地追溯這個龐大而複雜的人群的來源，除了「西南夷」之外，無論是後來的僚、洞、蠻、夷，還是其他名稱，看來都不完全適合作為「苗」的前世族群，也無法讓學者梳理出清晰的線性的苗族史系譜。^⑭

現在，民族學和人類學逐漸從「本質論」轉向「建構論」，傾向於某些族群是通過歷史上的認同逐漸形成的，這種說法當然有道理。只是我仍然傾向於「本質」與「建構」的結合。這就好像冬天滾雪球，總是要先有一個雪團，然後才能越滾越大一樣。我以為很有可能這個自稱「Hmong」也被人稱「苗」的族群，原本就是從西南夷中某個群體開始，經過漫長的歷史逐漸建構，又被後來的「民族識別」形塑出來的。但是，歷史上最早最核心的那個雪團，究竟是什麼，現在已經無法說清了。當年鳥居龍藏也曾經感慨地說，純粹人種意義上的「純苗」不過數種而已，「其他均非純粹之苗也」。其實，我們不妨更進一步說，從一開始就無所謂什麼「純苗」，就像沒有「純漢」一樣，這些族群在歷史上早就雜糅了各種來源和成分。^⑮

顯然，我們必須時時警覺，在民族史的學術研究中，這些出自滿漢官僚士大夫之眼的《苗蠻圖》，並不是準確和系統呈現貴州族群情況的資料，必須看到它的背後，還有「觀察者」的主觀想像和文化偏見。

四、化生可以成熟？從「西南夷」到「祖國西南」

毫無疑問，「苗蠻圖」或「百苗圖」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人種誌，只是人種誌的某種圖像資料。如果不加分辨地把它當做土著或異族的資料，我以為，需要小心再小心。前面我說，因為圖繪蠻夷的時候，那些圖像經過了繪圖者的眼睛。如果注意這些圖像資料的作者，你會發現，他們都是滿、漢官員或文人，無論是伯麟、陳浩還是六十七。有學者曾經提醒我們，《皇清職貢圖》中有各色族群異國，唯獨沒有漢人、滿

^⑬ 伊茨著，馮思剛譯，《東亞南部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頁310。

^⑭ 例如中古時期的五溪蠻，現在被認為和侗族、畬族、土家族都有關係，那麼，這個系譜如何處理？其實，一些民族史研究者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如田玉隆等，《貴州土司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的〈代序〉中就已經指出，「古代民族不是都發展成今天民族，同一民族的人也不完全發展成今天的民族。古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有分裂出去，又有同化進來……長江流域以南，現在有二、三十個民族，其先民自古交錯雜居，這就決定了這個地區的古民族在稱謂上具有專稱和泛稱性質，例如蠻、夷、濮、僚、苗、越等古民族，就分別發展成今天南方各民族，都可說是今天南方民族的共同祖先，這就是古民族的泛稱性」（頁4-6）。

^⑮ 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頁45。

人和蒙古人，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在圖繪異國和蠻夷這些帝國的「他者」時，滿、漢、蒙人都是帝國的「我者」。

不過，從這些圖像與文字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央帝國努力把「異域」變成「新疆」，逐漸使苗疆「文明化」的意圖。這就是所謂化「生」成「熟」，正如前引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說，「文明化的序列，即民、熟番、生番的序列，也同時是國家統合從強到弱的序列」。⁷⁶由「生」變「熟」，如前所說，就是使「向無君長」的苗彝成為編戶齊民，把「他者」改造成「我者」，把異類文化納入主流文明。我們可以從中觀看，在各種《苗蠻圖》或《百苗圖》之類的圖像中，作為觀察者和繪製者的滿漢知識人和政府官員，是如何理解他們眼中的「苗彝」的。

「黔地夷風本是蠻」。⁷⁷在他們的眼中，蠻夷就是意味著野蠻。正如康熙年間陳鼎《滇黔紀遊》中所說，「（九股苗）以十一月為歲首」、「元旦殺牛、焚布以祀天，自古不服中國」，並且燒殺搶掠，騷擾四境。⁷⁸愛必達《黔南識略》中也說，苗疆的「苗、仲、仡、保、瑤、僮之族，蜂屯蟻聚，大抵多疑尚鬼，嗜戰鬥，重報復，輕矯剽悍，易動而難靜，於西南諸蠻夷為患尤劇」。⁷⁹不過，隨著朝廷逐漸從間接羈縻轉向直接統治，這些被視為不文明的蠻夷，在朝廷和軍隊的武力管控與官僚和士紳的文明教化的雙重影響下，似乎顯示出從野蠻到文明的變化，熟苗和生苗之間，只是有著「先進於禮樂」和「後進於禮樂」的差異。那麼，在《苗蠻圖》的繪製者心目中，文野之分在哪裡呢？其實，就在歐美學者往往不願意使用，而我們常常不加分別地使用的概念「漢化」上。

在各種各樣的《苗蠻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野之分或者說「漢化」和「夷化」之分，大致上可以包括以下幾類：⁸⁰

（1）《苗蠻圖》描繪近乎文明的苗人，往往說他們採用農耕方式，男耕女織，而且遵紀守法，而描繪近乎野蠻的苗人，往往會描繪他們依靠狩獵，手持兵器，飲血茹毛，而且違法亂紀。像黑腳苗「頭戴白翎，出入成群，手持兵器，以搶劫為能」；生苗「多野性，所食咸生物，即鳥魚之肉，亦以微熱帶血為鮮美」，仡佬「獵獸即咋食如狼」，而且「男子出入佩刀弩，有仇必報」，而清江的黑生苗則有如強盜，「性情兇惡，訪知富戶所居，則勾連惡黨，執火把持長鏢利刃以劫之」。（圖四～五）

⁷⁶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王曉毅譯，《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頁146。

⁷⁷ 早稻田大學藏本《黔省諸苗全圖》中「紅仡佬」一頁題詞。

⁷⁸ 陳鼎，《滇黔紀遊》，頁18下。

⁷⁹ 愛必達，《黔南識略》，〈原序〉，頁15。

⁸⁰ 以上均參看國內外收藏的清代各種《苗圖》，如《苗蠻圖說》（劍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苗蠻圖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黔省諸苗全圖》（早稻田文庫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蠻苗圖說》（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苗蠻圖冊頁》（巴黎：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等。國內收藏頗多，可參看李漢林，《百苗圖校釋》。



圖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苗蠻圖冊》之「生苗」



圖五：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苗蠻圖說》之「豬屎佬佬」

(2)《苗蠻圖》描繪近乎文明的苗人，往往說他們的日常生活清潔整齊，按照禮法，畏懼官府，而描繪近乎野蠻的，往往會描繪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桀驁不馴、混亂骯髒、多重巫覡。比如，豬屎仡佬、剪頭仡佬，在他們筆下，就是「身面經年不洗，其臭穢不堪，與犬豚共處」，而平越的鍋圈仡佬「病不服藥，用面作虎首，延鬼師禱之」；而紫姜苗則「輕生好鬥，如遇仇人輒生啖其肉」。

(圖六)

(3)《苗蠻圖》描繪近乎文明的苗人，往往說他們家族關係有序、婚喪嫁娶按照禮儀制度，比如婚姻有媒妁之言等等；而描繪近乎野蠻的，往往會描繪他們男女關係混亂，對尊親不敬。例如，平越天苗女子造樓野處，吹笙誘人苟合；青仲家男女之間「所私者曰馬郎，夜則與之飲，父母知而不禁，唯避其兄弟，婚姻苟合」；大定的白倮羅人，凡死就用牛馬草裹而焚燒，而威寧郎慈苗在父母死後，更是把死者的頭硬扭到反向，「謂曰好看後人」。

(4)《苗蠻圖》描繪近乎文明的苗人，往往說他們通漢語，讀書入泮（圖七），而描繪近乎野蠻的，往往會描繪他們不識文字，沒有教養。比如白倮羅不僅茹毛飲血，而且「地屬鬼方人信鬼，蠻文蚓結漫無稽」；青仲家則「不知正朔文字，以木刻為信」。

在形容這種從野蠻向文明轉變的圖像和文字中，常常看到雍正年間改土歸流的關鍵性影響。像「黑苗」原來性悍好鬥，但「自雍正十三年剿撫後，凶性已斂」，而清江的黑生苗，「自雍正十三年收服後，今咸向化矣」。很有趣的是，無論是滿、蒙、漢官員，他們心目中「人皆向化」的這種「化」，都是以傳統漢族的儒家禮樂文明為標準的。同時，這些過去在主流文化邊緣的區域，在被「殖民」和被「征服」的過程中，一些土著族群的精英也在逐漸順應帝國的政治權力，他們一方面在與中央王朝的合作



圖六：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苗蠻圖說》之「九股苗」



圖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苗蠻圖冊》之「宋家」

中，尋求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⁸¹一方面在新的文明中重新審視和定義自己的身份和文化。⁸²我們從文獻中看到，這些土著族群的精英，除了爭取朝廷任命、學說漢語、改用漢姓、常穿漢服之外，他們往往藉由以下幾種方式，融入帝國的主流文明，包括（1）參與科舉，進入王朝的官僚系統；（2）重寫族群歷史，建立新的譜系；（3）疏通官府，爭取新的封敕任命，贏得合法性權力。

這說明了什麼呢？我在《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一書中，曾經對這種被稱為「漢化」／「殖民」的過程有一些討論，⁸³這裡不妨進一步申論。我以為在貴州苗疆的「改土歸流」的歷史過程中，有三個面向都必須給予同等注意：

第一方面是武力征服。這種類似「殖民」的歷史過程中，既有血也有火，伴隨著殘酷的殺戮，才把西南各民族逐漸納入帝國版圖，當作政府直接管轄下的編戶齊民。前

⁸¹ 濱下武志指出，土司土官的朝貢，由禮部所屬的會同館設市進行貿易，貢品包括馬和金銀器等，「在回賜方面，以馬一匹鈔 100 錠的標準給予回賜。另外，對於朝貢的賞賜，要按規定以土官的官品級別分別給予不同的回賜」，「對朝貢給予的回賜報酬很多，以鈔（紙幣）和絲織物進行支付」，見濱下武志著，朱蔭貴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41；其實，中外學者早就指出，傳統的「厚往薄來」政策，說明對於中國的統治者而言，朝貢的政治象徵和道德價值是最重要的，但從爭相前來的現象看，對於外國與邊緣族群來說，朝貢行為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貿易或賞賜的物質利益。

⁸² 有學者把這種順應朝廷政治權力的現象，叫作土司地區的「國家認同」，但土司這些行為的目的，是否就是認同「國家」？這一點可以討論，見彭福榮，〈試論中國土司國家認同的實質〉，洪濤主編，《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新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陳季君，〈論土司地區的國家認同〉，《中國史研究》2017.1：23-34。

⁸³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87-101。

面我們曾提及雍正年間鄂爾泰對貴州「改土歸流」時的若干戰爭，其實，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中，這種殘酷的征服一直沒有停止過，⁸⁴例如，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二年（1795-1797），就有朝廷對以臘爾山為中心吳八月、石柳鄧的苗民反抗進行鎮壓的戰爭；咸豐五年至同治十一年（1855-1872），也有清朝軍隊對以貴州六廳為中心，張秀眉等領導的苗民反抗進行長達十幾年的戰爭。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中，清帝國軍隊的手段相當殘酷，如乾隆六十年（1795）福康安率軍攻陷臘爾山苗寨時，曾把苗人首領石三保家的祖墳「刨挖七處，悉令挫骨揚灰」；而咸豐同治年間清軍平定張秀眉反抗後，貴州當地「上下游廢田不下數百萬畝，流亡可復者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戶口，較前不過十之三」。當時是「村市瓦礫，田隴荒蕪，思（州）、銅（仁）一帶，榛莽成林，民以溝壑餘生」。⁸⁵有歷史學者統計，在一百多年中，有數以百萬計的苗人在這種征服戰爭中死亡，儘管最終大清帝國完成了州縣制度和編戶齊民的大業，但這慘痛的歷史，不能不說是所謂「漢化」或「文明化」的代價。⁸⁶

第二方面是文化教育。在清朝官僚與士人的心目中，生苗與熟苗的差別有三：一是與漢族關係之遠近，「生苗概不與漢族接近，唯熟苗則尚有交通」；二是接受官府制度與否，「黔中向以剃髮者為熟苗，蓄髮者為生苗，熟苗能通漢語，安分守法，生苗則梗頑難化，與漢為仇」；三是生活方式是否文明，即是飲血茹毛、劫掠為生，還是男耕女織，力田務農。因此，在大清帝國推動的「化生為熟」過程中，官僚與士人實際上是以漢族文明作為標準的，所以常常說，要「變苗為漢」。因此，他們一直強調推廣男耕女織、識字守法、婚喪禮儀等漢族傳統文化和習慣，通過教育使得苗族接受漢族儒家禮樂習俗，以此改造和馴服那些異族。從雍正年間鄂爾泰、張廣泗建議設立義學「化導苗民子弟」起，逐漸增加州縣應試定員，把這種通過進學、科舉改造苗人文化的舉措制度化，他們相信這種措施不僅影響熟苗，而且「因之化外生苗率皆聞風向化」。⁸⁷在同治年間，曾紀鳳、羅應旒等有關治理貴州苗疆的各種建議中，也一再說到「變苗為漢」或「化苗為漢」，他們強調這是帝國治理苗疆的重要策略。而所謂「變苗為漢」的主要途徑，就是用漢族文化改變苗族習慣。曾紀鳳所謂治理方略「七

⁸⁴ 其實，這些戰亂的原因就來自對苗民的嚴酷統治、枉法貪腐、敲詐勒索。光緒年間的羅文彬等對被稱為「苗禍」的這些事件有相當清醒的反思，他說，「苗禍之興，半由抑勒，教匪之起，多藉征收。抑勒之弊，官吏、通事、土司、奸商，扶同比，事不一端，人不一術也；征收之弊，踣斃、踢斛、樣盤、零尖，巧取術弋，不在正供，而在格外也」。《平黔紀略》，〈例言〉，頁8。

⁸⁵ 羅文彬等，《平黔紀略》卷一九，頁532。

⁸⁶ 根據前蘇聯學者伊茨的研究，清朝平定西南苗族的一百五十年間，被消滅的苗族人達六十一萬人，僅僅雍正四年（1726）雷公山一戰，就殺死苗人一萬，餓死四十萬，見伊茨，〈爭取獨立的鬥爭是中國南方民族在清代統治時期民族發展的因素〉（李佩娟譯自莫斯科出版的俄文本《亞洲民族發展史》），《民族史譯文集》第五集，頁66；而日本學者村松一彌〈關於苗、瑤、壯、彝族的歷史〉則認為，在雍正、乾隆年間「一千二百二十四個苗族村寨被燒毀，四十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餓死）」，而咸豐、同治年間平定苗亂，「約有一百萬人死亡，倖存者僅數萬人而已」（陳翠年譯自《中國的少數民族：その歴史と文化および現況》），《民族史譯文集》第五集，頁83-84。

⁸⁷ 關於這一方面的資料，不一一列舉，可以參看《貴州通志》的〈學校志〉之記載。

條」中就說到，自從雍正年間新設立六廳，雖然沒有學官，但是八寨、丹江、都江、台拱、古州等等都設立了義學，「即奉諭旨，選擇塾師，訓導苗人，並准酌取入學，涵濡至今，駸駸乎椎髻衣冠矣」。所以，在新的形勢下，應當把六廳改為帝國正式的州縣，並設立正式的學官。他認為，這樣「養之教之，漸之摩之，當不難化狃榛為文物也」；⁸⁸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著名士大夫陳寶箴對王文韶的建議，他認為「欲永絕苗患，必先化苗為漢」，而具體策略就是「除令雜髮繳械外，欲令其習禮教，知正朔，先自讀書，能漢語始」，要招募通漢語和苗語的人為教習，「使苗人子弟入學讀書，習漢語」，同時「復嚴禁苗俗，如男女跳月，兄弟轉婚，及椎髻拖裙，黑衣帶刀，祀牛角不奉祖宗之類」。⁸⁹

第三方面是主動適應。當地苗族精英們，他們為了利益和權力，想方設法進入王朝的政治秩序，也為了生存，不斷修正自身的身份和文化，我們應當注意到這種邊緣族群進入主流的主動和尋求承認的努力。⁹⁰

毫無疑問，帝國對於邊緣的統治相當殘酷，就連皇帝也不能不承認，「從前漢人視苗人如奴隸，多方凌虐，以致激成變端」，⁹¹但是，畢竟帝國時代的所有權力和利益都來自皇帝，很多苗族上層人士甚至一般民衆，在帝國統治之下，只能通過靠攏官府，攀附皇權，甚至混同漢族或躋身主流來獲得權力和利益。在這一方面，大約有三種途徑最為常見，首先，是通過讀書習得漢族文化，借助科舉成為官僚階層，這是清帝國本來就十分鼓勵的途徑。因此，雍正十二年（1734）苗疆黎平土司龍紹儉，就曾經請求參加科舉考試，因為「漢官之前途遠大，而土職之上進無階」；⁹²其次，是順應時勢，改變習俗和服裝。羅應旒曾舉湖南鎮、寧三廳和四川黔、彭、西、秀四州為例，說那裡「苗人言語服制與漢人同，雜處相安久矣」，甚至當有人被說成是「苗人」的時候，還要「爭辯為恥」。在權衡利弊之後，部分生苗也往往會像熟苗一樣，逐漸在語言、服飾、生活上向漢人靠攏；⁹³再次，是重新書寫自己的族群系譜，攀龍附鳳地把歷史追溯到漢族地區名門望族。譚其驤先生〈播州楊保考〉曾經講過一個貴州的例子，即明初宋濂《楊氏家傳》曾記載播州楊氏（赤水河流域少數族群）出自太原，

⁸⁸ 羅文彬等，《平黔紀略》卷一九，頁530。

⁸⁹ 羅文彬等，《平黔紀略》卷一九，頁535。率軍征討苗民的清廷將領曾璧光、周達武也上書建議，「此次平定後，無論生苗熟苗，胥令雜髮繳械，且變其服飾，雜服藍白，不得仍用純黑。於此再嚴行保甲，杜其盜源；酌設義學，導以禮教，庶幾化夷為漢，可圖久安」（頁525）。

⁹⁰ 這一類當地族群精英通過讀書和科舉，逐漸融入主流的資料很多。正如賀長齡，《滇省西南諸夷圖說》〈序〉中所說，「我朝聲教遠敷，諸夷與漢人雜居者，多知向化讀書習禮，不惟列庠食餼者比比而出，且綴科名登仕版者亦頗有人，服食婚喪悉變漢俗，諱言為夷矣」（德國萊比錫民族學博物館藏本，頁1）。

⁹¹ 羅文彬等，《平黔紀略》卷一九引上諭，頁533-534。

⁹² 見晏斯盛，《楚蒙山房集》之「土司鄉試」，《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10），第270冊，頁84。參看陳季君，〈論土司地區的國家認同〉，頁32。

⁹³ 羅文彬等，《平黔紀略》卷一九，頁531。

後在會稽爲望族，並和楊家將後代楊充廣在廣西通譜，也算是太原楊家將一族，他指出，這是漢化之後的「依附虛構之辭」。⁹⁴其實這種情況非常多，有人懷疑所謂戰國宋、蔡之後裔的宋家苗、蔡家苗，就是後來攀龍附鳳構造的族源，而且越到貴州日益納入帝國，這種自稱祖上來自漢族地區的例子就越多。有學者以大方謝氏重修《世系考》自稱苗人謝氏是明初隨同明代建文帝出逃者，故祖先來自南京爲例，指出「杜撰祖先是漢人，清代嘉、道時極爲盛行，有權勢有財勢者重修族譜，都附會漢族爲祖先」。⁹⁵

以上這三方面綜合起來，加上建驛路、設州縣、建保甲等帝國制度在苗疆的逐步落實，⁹⁶這才是所謂「漢化」的全貌。也正是因爲部分苗彝在明清兩代日漸「漢化」，加上他們歷來「無君長，不相統屬」的社會狀況以及這一區域的非漢族群並未形成共同的歷史系譜，所以，他們並不像滿蒙回藏那樣，成爲中國內部「異質性」很強的族群。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晚清民初重建「中國」的時候，他們就往往被忽視而不列於「五族」之內，處於尷尬的位置。一直要到二戰中，大後方西南地位日漸重要，這裡的民族問題才逐漸凸顯，成爲學界關注的焦點。而最終成爲一個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民族，恐怕還要經過一九四九年以後所謂「民族識別」，才整合與形塑出這個擁有近千萬人的統一的「苗族」。

這裡重新討論一下所謂「漢化」。如果我們能夠回到那個時代，我們可以知道，在沒有另外一種強勢文明衝擊的情況下，來自漢族的儒家禮樂文明，曾被當做「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規則和普世價值。在傳統帝國時代即使是滿族統治的清代，滿、蒙、漢知識人和官僚仍然會不自覺地認爲，唯有儒家禮樂文明才文質彬彬，有了「文明」才能建立「秩序」。因而，迫使異族文明化即「漢化」，不僅是帝國官僚也是士紳以及讀書人的責任，而且還可能有當地族群精英們融入主流的自我改變。⁹⁷當然，從世界歷史變遷大勢，也就是後見之明來看，這只是一種對自身傳統的想像，傳統中國的知識人和官僚們，把原本是地方性的儒家禮樂文化，當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

⁹⁴ 一個也是貴州地區的例子，可以參看譚其驤〈播州楊保考〉。此文指出，明初宋濂《楊氏家傳》記載的播州楊氏（赤水河流域少數族群），其實本來就是瀘、敘二州遷來的少數民族「這種民族應爲羅族（今稱彝族）的一支」。載《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82.1：1-23。

⁹⁵ 田玉隆等，《貴州土司史》，頁10。

⁹⁶ 雍正年間改土歸流過程中，苗疆不斷開通道路，設立了各級州府縣廳，並且「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約束稽查」，同時徵用「諸苗悅服之人，立爲苗長，以稽捕緝之事」，讓苗民管理地方秩序。見蔣良騷，《東華錄》卷三〇、卷三二記載雍正七年至十二年事，頁428, 496等。

⁹⁷ 羽田亨，〈漢民族の同化力説に就いて〉曾經引用一九〇四年白鳥庫吉在東京帝國大學的講義和一九三六年王桐齡在東洋史談話會的講話，認爲「漢化」是由於古代東亞漢文化程度最高，其他民族也以漢文化作爲「最高標準」，因此，漢化常常是一種必然趨向〔引者：當然也有反向「胡化」的情況〕。但這種「漢化」並非僅僅是由漢族自己的力量，也是由進入中國的異族自己參與、承認並製造出來的。原載《東洋學報》29.3/4（1944），後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歷史篇》（京都：同朋舍，1957, 1975），頁716-726。

文明，把「漢化」看做「文明化」。所以，十九世紀之後，西潮東來，在堅船利炮之下，另一種來自西方的地方性文化顯示出優越性，並成為強勢的普世文明，於是，儒家禮樂文化就從「普世的」轉為「地方的」，「漢化」則成為歷史敘事中，既尷尬而又政治不正確的概念。

五、難題仍在：從苗蠻圖說到中國民族史研究

可能很多學者都注意到，近幾十年裡，中國華南和西南邊緣區域的族群、文化、歷史成為西方學界關注的研究領域，出版了很多著作，⁹⁸略舉幾例如：

郝瑞（Stevan Harrell），*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成為民族之路：中國西南地區》（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⁹⁹

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創造壯族：中國的族群政治》（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¹⁰⁰

何羅娜（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中國的人種誌與圖像學》（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¹⁰¹

王富文（Nicholas Tapp）和丹·庫恩（Don Cohn）合編，*The Tribal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ithin*《中國西南的部族：中國人對國內「他者」的觀點》（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2003）。¹⁰²

⁹⁸ 根據鄭立波、李沛容，〈西南邊疆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美國現代學術視野下的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的統計，從一九九三年到二〇一三年，美國各大學與明清時期西南邊疆研究直接相關的學位論文近30篇，從二〇〇一年起到二〇一三年，美國出版有關西南邊疆與民族的著作，關於雲南的3種，貴州和廣西的各2種，四川的1種，跨雲貴川的1種。見《思想戰線》2013.6：151。但這也許還不是全部。

⁹⁹ 另有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¹⁰⁰ 此書有中譯本（儂春明譯，雲南民族學會壯學研究委員會自印本，內部發行）。

¹⁰¹ 有關此書的書評論文，可以參看吳莉葦，〈比較研究中的陷阱——評勞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業》〉，《史學月刊》2005.6：83-92。

¹⁰² 這是他們對《百苗圖》的翻譯和解說。其序言用了一個「在邊陲」（In the Borderlands）作為標題，很有相對中心，作為邊緣之意味。王富文（Nicholas Tapp, 1952-2015）是一個苗族研究領域中很值得注意的學者，他曾經在泰國和中國研究過苗族，在泰國清邁的苗族區域生活過十八個月，並且因為居住在一個姓王的苗人家庭中，所以自己取了一個漢文名字姓王。他在華東師大的一個報告中指出，泰國的苗族由於在國內處於邊緣，所以曾經一方面種植鴉片以換取資源，一方面則與泰國共產黨走得很近。但是，他在那裡調查很順利，因為「泰國是一個相對地開放、簡單而天真的社會」。但是他在貴州、雲南調查卻相當麻煩，不僅因為有「陪同人」，而且被調查的苗族人對調查者有「極度懷疑和不信任」，原因為中國的苗族是在一個「對信息有很高意識和關注的社會」，中國不斷的人口、資源、區域調查和嚴密的社會管理，其實已經把苗人的敏感與懷疑刺激出來了。王富文，〈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及其風險的反思〉，《歷史人類學學刊》13.2（2015）：165-183。

喬荷曼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民》(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¹⁰³

楊斌 (Bin Yang),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季風之北，彩雲之南：雲南的形成（公元前二世紀—公元二十世紀）》(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毫無疑問，這些著作的出現，表現了歐美學界近年來受到新的歷史觀念、理論和方法的影響，對於「殖民」、「帝國」，以及「邊緣」、「流動」等歷史的關注，因此邊緣族群的歷史研究成為熱點。

但是從學術史上看，我把它看做是近年來西方學者對傳統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反思和審視。

衆所周知，中國的民族史研究，如果從重建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晚清民初開始發端（梁啟超、蔣智由、章太炎、劉師培），那麼，在二、三〇年代，則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著述，由於在晚清民國時期特殊的國族危機背景下，這一學術演進過程有特別的歷史語境。以標明「民族史」為題的幾部名著為例：自從一九三〇年繆鳳林的〈中國民族由來論〉和〈中國民族史序論〉在《史學雜誌》第二卷上發表，呼籲重修民族史以來，¹⁰⁴十年之中連續出現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文化學社，1934；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此書是他在1928年燕京大學開始寫作的）、呂思勉的《中國民族史》（世界書局，1934）、宋文炳的《中國民族史》（中華書局，1935）、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商務印書館，1939）等。這些中國民族史的著作，在具體問題論述上可能各有異同，但是，由於他們都深受晚清民初重建現代中國大思潮的影響，又撰寫於抵抗「侵略」和警惕「分裂」的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在日本即將或已經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時代背景下，深受傳統大一統王朝歷史的影響，又懷有統一國家領土完整的焦慮，使得他們在討論中國民族史的時候，大多都要捍衛「中華民族」的本土性和多元性，試圖把中國境內各種民族的歷史，敘述為一個仿佛百川歸海的過程。因而中國民族史研究大體秉持一個基本立場，貫穿一個基本線索，這就是：（1）中國的中華民族，是漢族與其他各族滿蒙回藏苗等共同構成的。¹⁰⁵（2）漢族之外，中國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各有起源與發展，但與

¹⁰³ 有關此書的書評論文，可以參看李林，〈「開化」與「殖民」兩套詮釋話語的論爭與困境——兼與 John E. Herman 教授商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2013）：151-170。

¹⁰⁴ 繆鳳林，〈中國民族由來論〉及續篇、〈中國民族史序論〉，分別載《史學雜誌》2.2-4（1930）：1-18，1-23，1-10。

¹⁰⁵ 例如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北京：文化學社，1934）基本持「合六族為一大中華民族」的觀念，「中華民國為漢、滿、蒙、回、藏、苗六族混合體」（頁2-3）；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世界書局，1934；重印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第一章〈總論〉更認為，中國有十二族（漢、匈奴、鮮卑、丁零、羯、肅慎、羌、藏、苗、越、濮、白種），而世界各國很難有多民族，「唯我中華，合極錯雜之族以

漢族總是有某種淵源。¹⁰⁶（3）這些民族在歷史上彼此融合，而融合的途徑往往是「漢化」，漢化的結果則是「文明」。¹⁰⁷

在民族危亡的命運面前，學術與政治、學者與政治家，逐漸形成有關中國民族史的一個共識。一九四三年，在由蔣介石本人起草（一說為陳布雷起草）、陶希聖等人潤色修訂的《中國之命運》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中，把中國境內各個族群比喻成「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並特意指出：從歷史上說，中國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從疆域上說，中國包括了黃河、長江、黑龍江和珠江，從民族上說，中國包括了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族，但在中華民族中，他們都被同化，「融為一體，更沒有歧異的痕跡」。¹⁰⁸ 儘管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成為中國的控制者，但是，這一民族史基本立場似乎並沒有變化，甚至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¹⁰⁹

當然，我能夠理解這一立場的某些歷史合理性。這種後來被稱為「多元一體，民族融合」的立場之形成，不僅有它的特殊歷史背景，也有它的現實意義：首先，在涉及疆域或領土問題的時候，無形中強調了主權範圍的固定，避免了由於歷史疆域變動而引起的現實領土紛爭；其次，在涉及民族區域的管理上，由於認定了中華民族之內各族都是兄弟民族，所以支援了民族自治區域的優待政策；再次，在涉及民族地位平等的問題上，由於承認各個族群互有關聯而又各有淵源，意圖避免歷史糾紛。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中國民族史研究上就形成了幾個特徵：（1）因為要捍衛中國的統一，

成國」（頁6）。又如張大東，《中華民族發展史大綱》（重慶：軍訓部西南游擊幹訓班，1941）更強烈主張「中華民族自古同源」，這與歷史學界的一些看法不太一樣。

¹⁰⁶ 例如王桐齡接受「中國人西來（帕米爾高原）」說，並且認為，這些生活在中國（後來的中國）空間內的各族有共同來源。《中國民族史》中說，「中國人」從帕米爾高原分成兩道，往東南發展的為「南三系」：一，包括長江、西江流域之吳越楚人，西南之獠苗瑤獯蠻人，南方之暹羅、越南人；二，黃河流域之漢人，三，青海西藏之圖伯特人，即藏族；往東北去的「北三系」，分別是：一，前往東北的通古斯人，如女真、滿洲〔引者：何不包括高麗渤海朝鮮人？〕；二，正北方的蒙古，三，中國西北的突厥—回族（頁2-3）。實際上是從後見之明，即現代中國的族群狀況，反向追溯，把這些原來可能不同的族群，從根源上歸為一家。例如二戰中，「苗漢同源論」曾在大後方頗引起爭論，參看署名「魯格夫爾」幾封反對「同源論」的來信和顧頡剛的回答，參看顧頡剛，〈答魯格夫爾君〉，《顧頡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36冊，《寶樹園文存》卷四，頁141-144。但這種說法，由於有維護國族團結的背景，所以在當時相當流行，例如張廷休，〈苗夷漢同源論〉，《中央週刊》1.33（1939）：2-4和〈再論夷漢同源〉，《西南邊疆》6（1939）：1-9。

¹⁰⁷ 例如王桐齡《中國民族史》說，漢族為中國主體的時候，外族逐漸同化於漢族：一是雜居（移民入內地，分地為郡縣），二是離婚，三是更名，四是改姓，五是養子；外族為中國主體的時候，異族逐漸同化於漢族，也有種種形式：一是自動的定居中原漢族故地，或被動地遷都或移民，二是離婚，三是更名，四是改姓，五是養子，六是易服色，七是更改語言文字，八是尊重道德倫理。（頁8-10）

¹⁰⁸ 見蔣中正，《中國之命運》（三青團平津支部印，1946），頁2-3。這個意思，在他基本取得中國的控制權的時候就已經表達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他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會作題為〈北伐成功後最緊要的工作〉的報告時，就說當時的理想是「要一個整個的國家，要一個整個的民族」，見《革命文獻》第21輯（臺北：黨史委員會，1959）。

¹⁰⁹ 《中國之命運》發表以後，代表中共的陳伯達等撰寫了《評「中國之命運」》（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4），陳伯達的批評文章中，把蔣介石有關中華民族中各族為「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說成是法西斯的血統論。但是，關於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基本判斷仍然沒有改變，只是把階級鬥爭的理論用在民族史上，認為中國歷史上是多民族，由於殘酷的鬥爭，而不是和睦地相融，逐漸才同化。（頁4-8）

所以要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而且特別強調歷史中的族群融合；(2) 因為要主張「中華民族」獨立的本土起源，所以要通過考古、文獻和民族學，尋找各個族群的早期歷史，並把它們匯聚為一個歷史脈絡；(3) 因為要說明中國內部各族群的共同歷程，所以既要以「文明優劣」為尺度，敘述各個族群「漢化」的歷史過程，又要以「族群平等」各個族群都有各自的文化。^⑩

可是，這樣的立場和意圖，使得中國民族史的論述，有了若干無法改變的「基本預設」——

第一，因為要論證中國的「大一統」、「多元一體」或「中華民族大家庭」，所以，要追尋「共同歷史根源」和「共同民族象徵」（黃帝、炎帝、顓頊、蚩尤、盤古），要發掘族群和文化的彼此「融合」，敘述一個「百川歸海」式的民族史。^⑪ 雖然這種民族史敘述，在二十世紀有著建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中國）和塑造一個多元民族（中華民族）的意義，^⑫ 但這是否也可能忽略（1）有的族群（尤其是非漢族）自有其獨立的歷史淵源和發展脈絡；（2）可能淡化歷史上的彼此殺戮和激烈衝突；還可能導致（3）民族史不能面對中國自身曾經是「帝國」或「殖民」這樣的問題？^⑬

第二，因為受到族群「本質論」的影響，民族史常常習慣於追溯各個民族的「起源」、「歷史」和「祖先」，試圖通過循名責實的歷史文獻學方法和語言、體質、習俗、

⑩ 王明珂曾經把這種歷史叫作「典範中國史」或「典範中國民族史」。他說，晚清民國陸續撰寫出來的中國民族史論著奠定了「這樣的歷史知識，說明由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構成之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也說明他們之間的區分——除了各民族間的語言、文化等區分外，還有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間的勝利者與失敗者，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文明先進者與落後者，以及施予者和被施予者等區分，皆為『歷史』所肯定」。見王明珂，〈從中原到邊疆：對典範中國史的反思〉，《文化縱橫》2015.8：34-35。

⑪ 例如江應樑、林超民的《中國民族史》。李埏為其撰寫書評時，就特別強調它的特色，一是「突出中華民族的整體性」，二是「突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性」，三是「突出各民族之間相互聯繫的有機性」。見李埏，〈薪盡火傳，繼長增高——書《中國民族史》後〉，原載《雲南社會科學》1991.6，收入《李埏文集》，第五卷，頁178-180。

⑫ 這種說法在抗戰時期，成為主流和共識。雖然有的歷史學家，如傅斯年、顧頡剛等，仍然堅持歷史上的諸民族，是在長期逐漸融合才成為中華民族的，但包括民族史在內的諸多領域，有相當多的論述，都直接認定各族「同源」，如前引張廷休〈苗夷漢同源論〉、〈再論夷漢同源〉（1939）、張大東《中華民族發展史大綱》（1941）、朱謙之〈中華民族之世界分佈〉（1941）、姚薇元〈中華民族之整體性〉（1945）；即使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甚至改革開放之後，這種說法也一直是主流。不妨舉兩個例子：最近如馬大正，〈關於邊疆民族文化特色化發展的思考——《東北文化叢書》代序〉（載《地域文化研究》2018.2）就說：「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基本依據，『崇尚統一』是這個文化價值體系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頁2）。又，馬戎，〈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載《學術月刊》2018.1）說：「中華文明在結構上不僅包括作為其主脈的中原華夏文明，也包括中原地區周邊曾被稱為『夷狄』的各文化群體，換言之，即包括今天的『漢文化』和中國境內的蒙古、藏、維吾爾、滿、苗、瑤、彝等少數族群的文化，它們在幾千年混雜共存和交往交流交融進程中最終形成了一個『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頁151）。根據馬戎總結，中華文化一是世俗性，二是追求最高境界「天道」，三是罕見的包容度，四是文化交流中的和而不同和有教無類，五是認同核心是天道而不是西方文明的民族主義。

⑬ 例如王桐齡《中國民族史》，由於他把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滿洲等，從一開始就算成是「中國」之內的族群，所以把歷史上他們征服的地區，如匈奴之匈加利，突厥之伽色尼、塞爾柱克、阿斯曼，契丹之西遼，蒙古之欽察、察合臺、窩闊臺、伊爾汗以及帖木兒、莫臥爾，都成了中國民族的豐功偉績，算在中國民族史的「外延史」部分中。

服飾等民族識別原則，討論各個民族的歷史。^⑩但是，這是否會忽略族群的歷史，一方面有其各自淵源，一方面也有雜糅和建構？其實，苗族原來就未必是一個單線發展的「民族」（明清之「苗」，雜糅了仲家、蔡家、龍家、白人子、瑤人、漢族衛所後代，清代所謂八十二種苗，其實來源非常龐雜）。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他們可能是「原本就是從西南夷中某個群體開始，經過歷史逐漸融匯和建構，又被現代的『民族識別』形塑出來的」。同樣，其他如滿、回、壯等等民族史論述中，恐怕也同樣有這類的問題。

第三，因為很長一段時間，民族史論著多數出自漢族學者之「手」，來自漢族學者之「眼」，往往以「漢」與「非漢」為基本視角和觀察立場。這樣一來，無意中中國的民族史主要成為對「非漢」民族的歷史敘述，而「漢」則成為民族史中隱蔽的「觀察者」。這很容易把「漢化」當作天經地義的「文明化」，把帝國曾經有過的殺戮、殖民和征服，當作一種進步的、必然的歷史過程，也很容易忽略反向的「胡化」和「夷化」，於是把古代中國的「胡漢華夷」觀念，變相地納入現代的民族史敘事之中。其實，縱觀古代中國幾千年，正如我前面所說，往往是「南下，南下，再南下」的過程，也是一個「漢化、胡化、漢化、夷化」交錯的歷史，可是，過去的民族史論著在「胡化」和「夷化」這一方面，往往著墨不多。

第四，以隱蔽的漢族觀察者為基本視角，以現代中國民族構成作為民族史論述的歷史框架，用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倒敘歷史過程，這就造成了二十世紀以來的民族史論述中，固定的「中心」與「邊緣」。一方面，漢族之外的各個族群（滿蒙回藏苗等等），由於地理位置處在中原王朝之外緣，常常被當做「邊疆民族」，忽略了他們在歷史上，也曾經是某個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另一方面，由於歷史上各個王朝的疆域常常移動，僅僅以現代領土為歷史敘述的空間，因此有的族群又因為融入內地，而不能作為「邊疆民族」，「苗疆」之苗就是一例。但是，這種固定的「中心」和「邊緣」民族史觀，其實是一種以現代倒看過去的方式，完全站在當下的立場、觀念和事實中，逆向追溯中國史，容易造成「中心」凸顯而「邊緣」淡化，這對於我們理解曾經「各自為雄」、「自有封域」的非漢族群的歷史，其實是相當不利的。

那麼，我們的中國民族史研究，能不能突破這些固定的立場和預設，重新出發呢？這才是我這篇文章想提出的問題。

（二〇一八年八月修訂於上海）

^⑩ 例如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就認為，古代的九黎，就是今日的黎族，古代的蠻，則是今日的瑤人與畬民，並引章太炎《檢論》說今日之苗為古代之髦，又引古文獻如宋代朱輔《溪蠻叢笑》葉錢序文說崇拜盤古的五溪蠻，分為貓、瑤、獠、僮、仡佬，其中「貓」即「苗」。